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汉语大词典》 疏误与修订研究

HAN YU DA CI DIAN

SHU WU YU XIU DING YAN JIU

曲文军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 疏误与修订研究

HAN YU DA CI DIAN SHU WU YU XIU DING YAN JIU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曲文军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大词典》疏误与修订研究/曲文军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209-06069-1

I. ①汉… II. ①曲… III. ①汉语—词典学—研究 IV. ①H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3036 号

责任编辑: 王 晶

封面设计: 彭 路

《汉语大词典》疏误与修订研究

曲文军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24.25

字 数 41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6069-1

定 价 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0539) 2925659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汉语大词典》失误的类型(上)	007
第一节 释义错误	007
第二节 释义纰漏	028
第三节 沿袭旧误	047
第四节 方言误释	055
第二章 《汉语大词典》失误的类型(下)	065
第一节 立目失误	065
第二节 义项失误	081
第三节 书证失误	090
第四节 书证纰漏	107
第三章 《汉语大词典》疏漏的类型(上)	118
第一节 一般复词和词组疏漏	118
第二节 特殊复词和词组疏漏	133
第三节 典故疏漏	152
第四节 熟语疏漏	168
第四章 《汉语大词典》疏漏的类型(下)	181
第一节 专科词语疏漏	181
第二节 义项疏漏	196
第三节 书证疏漏	209

第四节 执行体例疏漏	222
第五章 《汉语大词典》疏失的原因	239
第一节 “四分体制”原因	239
第二节 历史文化原因	252
第三节 孤证资料原因	262
第四节 语言自身原因	276
第六章 对《汉语大词典》的基本估价	287
第一节 《汉语大词典》误释词目测估	287
第二节 《汉语大词典》疏漏词目测估	299
第三节 慎重断定《汉语大词典》的疏失	309
第四节 对《汉语大词典》的基本评价	322
第七章 修订《汉语大词典》的初步论证	333
第一节 修订《汉语大词典》的必要性	333
第二节 修订《汉语大词典》的可行性	348
第三节 《汉语大词典》修订的方向	359
主要参考文献	378
后 记	382

绪 论

我国汉语辞书的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自古以来,中国辞书就分出了雅书、字书和韵书三个门类:第一部“雅书”是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战国末)的《尔雅》,按意义来编排,已经初具词典的性质,被称为“中国百科全书”的萌芽。第一部字书是汉代许慎于公元2世纪(121年)编纂的《说文解字》,按汉字字形结构来编排。第一部韵书是成书于公元600年的《切韵》,按汉字的韵母来排列。虽然中国古代的辞书编纂事业比较发达,却一直没有产生现代辞书的概念,更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词典。

直到20世纪初,中国辞书开始与世界辞书接轨,这才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词典。1915年,中国第一部现代词典《辞源》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随后《辞海》、《国语词典》、《王云五大辞典》、《辞通》、《联绵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等中型词典相继问世,表明中国的词典编纂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些词典各有特色,又都有不足之处:在内容上,有的只收古代词汇,有的只收现代词汇,有的只收联绵词,有的兼收百科词汇。在规模上,以中小型词典为主,没有产生大型词典。在性质上,以共时性词典为主,缺少历时性的词典,更没有产生一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能够称得起“汉语语词总汇”的大型语文工具书。被外国人嘲笑为“大国家,小词典”的尴尬现状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

“盛世修典”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经周恩来同志批准,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汉语大词典》(为区别于《汉语大字典》亦简称《汉大》,以下简称《大词典》,但本书的章节名称、一般专著和论文名称中的《汉语大词典》不用简称)开始组织编纂。这部由上海、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五省一市的四百多名专家学者历时18年编纂的巨著,于1986年出版首卷,到1994年全部出齐。全书共十三卷(含检索表与附录一卷),收词达37.5万余条,共5000余万字。1997年《大词典》出版了上中下三册的缩印本。1998年又出版了《大词典》简编本和《大词典》电子版。《大词典》

的问世在中国辞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的全貌,是中华民族文化发达的象征,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国际性的权威工具书”。

《大词典》按照“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编纂方针,只收汉语的一般语词,着重勾勒汉语语词的历史演变过程。每一条词语的解释都尽可能地依据历史原则,理清词义的来源和演变、发生、发展情况。在处理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关系时,以词汇意义为主。同时考虑到词典的实用性和示范性,帮助读者解决可能遇到的各种语文问题,对词语的用法也适当进行了关注,把历时性词典和纪录性详解词典的特点融为一体。在具体编纂中,摒弃了过去一些词典惯用的东拼西凑和沿袭旧说的做法,在质量上超出了同等规模的《中文大辞典》(我国台湾)和《大汉和辞典》(日本)等大型语文词典。正如蒋宗许先生评价的:“《汉语大词典》是当今收词最多、解释最为详尽的汉语辞书,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上的贡献是任何汉语辞书尚不可取代的。”^①

词典被称为是“遗憾的艺术”,任何一部词典都不可能没有失误和疏漏。正像《汉语大词典·前言》所说的:“《汉语大词典》所涉及的知识面极为广泛,与社会生活、古今习俗、中外文化、乃至各种宗教教义,都发生纵向和横向联系,考订源流,绝非易事。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时时注意的是质量第一,尽可能做到正确、明晰,避免异说纷纭或模棱两可。但由于词目浩繁,时间紧迫,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②由于卷帙浩繁、编纂时间紧迫、可资借鉴的资料极少等客观原因的影响,以及受编写体制、编纂体例、作者水平等主观原因的影响,使得《大词典》在立目、立义、释义、选证、词目关联、编辑校对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失误和疏漏,有些甚至还是比较严重的失误和疏漏。从总体上看,《大词典》的这些失误和疏漏已经超出了“白璧微瑕”的界定。

自《大词典》首卷出版后,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大词典》的失误和疏漏的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从研究著作方面看,主要有王宣武的《〈汉语大词典〉拾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陈增杰的论文集《〈汉语大词典〉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王镬的《〈汉语大词典〉商补》(黄山书社,2006)、程志兵的《〈汉语大词典〉订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等,这些成果或是对《大词典》的部分词目进行补订,或是就编纂思想、

① 蒋宗许:《汉语大词典商补平议》[J]. 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193页。

② 罗竹风:《前言》[A]. 汉语大词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编纂方法等问题进行论述,虽然对《大词典》的研究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但还没有出现对《大词典》的失误和疏漏问题进行系统梳理的理论专著。从研究论文方面看,二十多年来不断地有一些对《大词典》进行纠误补漏的文章散见于各类专业期刊,但多是一些零星的、微观的、非系统性的研究,实证也比较单薄。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目前来看都还不是综合性、系统性、实证性的理论研究。真正要开拓对《大词典》进行综合性、系统性、实证性理论研究的新局面,为将来《大词典》的修订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我们所要做的工作还非常艰巨。

词典的编纂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质量要求高,持续时间长,涉及知识面广,编纂人员对此要付出繁重的劳动,所以有的学者把它看成是“智者不为”的事情。捷克词典学家兹古斯塔曾经说过,词典编纂者“现在是一名苦工,他将来仍然是一名苦工”^①。笔者作为《大词典》的编纂者之一,深知其中的甘苦。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一部词典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部词典在实用性方面也许会受到读者的赞扬,但再完美的释义也不要指望得到读者的赞扬。正像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作家都可以指望蜚声扬名,唯独词典编者只能希望不受指责。”^②因为词典是“典”,在读者看来,释义正确完美是天经地义的。一旦出现失误和疏漏,则会受到人们的指责。因此常常听到一些同仁有这样的感叹:编词典是最出力不讨好的事儿!

编纂词典的过程通常划分为确定选题、看书收词、分头编写、审读定稿、安排校对、装帧加工等环节。这些环节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才会产生必然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工程的每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词典的质量。自《大词典》第一卷问世起,人们就开始对它在各个环节的失误和疏漏进行关注。大部分学者认为,《大词典》的失误和疏漏属于“白璧微瑕”或“大醇小疵”,基本上无损于它极高的实用价值。有的学者则认为《大词典》的失误和疏漏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有“今人词典误人,真有不如不编之叹也”^③。

笔者不同意“白璧微瑕”或“大醇小疵”的观点,但也不敢苟同“不如不编”的观点。笔者的看法是:《大词典》毕竟为读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相比较而言,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大型汉语词典,同时又是一部问题非常多的大型汉语

① [捷]兹古斯塔:词典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90页。

② 引自阮锦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J].语文建设,1994年第9期,第16页。

③ 方健:汉语大词典涉茶条目证误释例[J].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第255页。

词典。对于《大词典》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本着“与其让外人发现问题,还不如自己去发现问题”的想法,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积累,发现《大词典》主要存在着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第一,各类失误的比例偏高。笔者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抽样调查方法,对《大词典》的释义错误、假目、误目、假证、误证等“硬伤”和概括失当、词性讹误、粗疏累赘、肤浅表象、种差模糊、编校失误等一般性“疵点”进行了统计。一种统计结果表明《大词典》的失误词目约占2.67%,另一种统计结果表明《大词典》的失误词目约占3.62%。如果按照第一种统计结果推算,《大词典》失误的条目当在1万条以上;如果按照第二种统计结果推算,《大词典》失误的条目当在1.3万条以上。这已经是一部小型词典全部词目的数量了。尤其不应该的是,部分字头的词目失误率简直高得惊人。如第一卷的“乜”字,共收词目11条,其中失误的就有3条,失误率已达27.27%。第五卷的“汤”字,共收词目84条,其中失误的就有9条,失误率已达10.71%。这些失误的词条,绝大部分是由于“孤证”原因或方言原因造成的。

第二,漏收符合收词原则的词目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一些《现代汉语词典》已经收录且使用已久的现代词语基本词汇都漏收了,如“粉尘”、“粉肠”、“粉丝”、“粉条”、“粉皮”、“粉芡”、“结仇”、“结扎”、“结石”、“结存”、“结幕”、“结束语”、“茶缸子”、“茶碱”、“茶盘”、“茶青”、“茶亭”和“茶锈”等。一些古代已有、现代常用的多义词也漏收了,如“陪床”、“招眼”、“周流”、“异化”、“繁复”、“四眼狗”、“台柱子”等。另外如“卸磨杀驴”、“凤去台空”、“疑人偷斧”、“匹妇小谅”、“罗罗清疏”、“四邻八舍”、“云山雾罩”、“明铺夜盖”、“虎落平川”、“二三其德”等成语和熟语也都漏收了。根据抽样调查,《大词典》漏收符合收词原则的词目当在10万条以上,约占已收词目的30%。部分字头漏收词目的比例高得惊人。如“捐”字至少应收12个词条,实际仅收2个词条,漏收10个词条,漏收比例高达83.33%;“坍”字至少应收20个词条,实际收录5个词条,漏收比例为75%;“嫖”字至少应收24个词条,实际收录6个词条,漏收比例为75%。《大词典》漏收了数量如此巨大的词目,往往会使人们对汉语词汇的入典总量产生模糊的认识。

第三,义项残缺的问题比较突出。部分多义项词目漏收了常见义项,更多的多义项词目变成了单义项词目。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长头”一词的义项可立4个,而实际只立1个义项(而且还是错误的义项),漏立义项比例为75%。“搭头”一词的义项可立8个,而实际只立2个,漏立义项比例为75%。“齐人”一

词的义项可立7个,而实际只立2个,漏立义项比例为71.43%。“回残”、“上宿”、“归班”等词目的义项可立3个,而实际只立1个,漏立义项比例为66.67%。更多的词目如“正脉”、“采薪”、“涩浴”、“挂红”、“挂口”、“收人”、“募妇”等多义词仅收一个义项,使之变成了单义词。

第四,书证资料相对匮乏。《大词典》使用的书证资料虽然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汉语词典,先后积累了资料卡片800多万张,从中精选出200多万张第一手资料作为确定词目和建立义项的依据。但这些资料对于37.5万个词条来说,还是太少了一些。由于书证资料的不平衡性,导致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孤证”词目,另外还有相当一批没有书证的“骷髅”词目。《大词典》释义失误、词目疏漏、义项残缺等问题的根源是错综复杂的,但根本原因在于资料匮乏。“词目疏漏”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书证,并非有了书证而不立目。“骷髅”词目是因为没有书证可用。义项残缺是因为书证不够用。而绝大部分释义错误是由于孤证造成的,如“作气”、“走趟”、“嘴吃”、“撅巴”、“攘丧”等释义错误和立目错误,如果能够有两条书证,一般文化水平的人都不会解释错误或立目错误。

为了尽可能地纠正和弥补《大词典》这四个方面的疏误,本书将以《汉语大词典收词原则》和《汉语大词典编写体例》为理论依据,按照《汉语大词典写稿格式》和《汉语大词典引书格式》的规定,^①以规范汉语词汇的释义、丰富汉语词汇的入典量为根本宗旨,以实证分析为基础,对《大词典》失误和疏漏的词目进行综合研究。对疏漏的词目,坚持无书证不补;对失误的词目,坚持无书证不纠。通过对失误和疏漏的具体分析,初步探讨《大词典》失误和疏漏的类型、原因与规律,并据以提出具体的修订建议。同时,通过对《大词典》的研究,力求探讨大型汉语词典编纂的基本规律,为今后国家组织力量编纂大型汉语词典和修订大型汉语词典提供借鉴,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汉语词典编纂的理论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

笔者的老师吉常宏先生担任《大词典》第三卷的主编,深知编纂一部优秀词典的难度。他说:“一部理想的大型汉语辞典,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纠谬正误,补苴罅漏,有待后贤。”^②笔者作为当年《大词典》编者中的一个小字辈,理应对《大词典》作出更多一些贡献。本书作为第一部对《大词典》疏误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目前还不是很成熟。由于学识浅薄,笔

① 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编纂手册[M].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1981年版。

② 吉常宏:汉语大词典往事拾零[J].辞书研究,1994年第3期,第136页。

者认为是者,未必为是;认为非者,亦未必为非。在这种情况下推出拙著是为了抛砖引玉:一是敦请国家有关部门重视《大词典》疏误造成的负面影响,及早把修订《大词典》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二是希望引起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对《大词典》疏误的高度重视,众志成城,集腋成裘,填补这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空白,为今后国家组织人力对这部巨著进行修订奠定理论基础和资料基础,并希望以此为基础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汉语大词典学。

第一章 《汉语大词典》失误的类型(上)

词典的释义失误是最易受到读者诟病的问题。本章主要讨论《大词典》释义失误的问题。《大词典》是一部多卷本的大型汉语词汇巨著,它摒弃了过去一些词典惯用的在旧出版物的基础上东拼西凑的做法,在质量上超出了我国台湾的《中文大辞典》和日本的《大汉和辞典》等大型语文词典。但是,由于受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大词典》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释义失误。这些失误共有两大类型十种情况:一是知识性错误、误解古意、定性错误、牵强附会、关系混淆等“硬伤”性质的失误;二是概括不当、词性讹误、粗疏累赘、肤浅表象、种差模糊等“疵点”性质的纰漏。失误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沿袭旧误,二是在编纂中产生的新误。《大词典》的释义失误最集中地表现在方言词目的释义上。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词典》的质量,并使它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第一节 释义错误

词典的释义就是对一个词的意义进行表述。这种“表述”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往往是衡量一部词典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任何一部词典都会将“释义准确”作为追求的目标,但释义失误似乎又是任何一部词典都不可避免的通病。从总体上看,《大词典》释义错误的条目,要少于《中文大辞典》和《大汉和辞典》,但释义错误的比例还是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从错误的类型来看,《大词典》的释义失误主要有知识性错误、误解古意、定性错误、牵强附会、关系混淆等五种情况。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将释义失误的五种类型具体分析如下。

一、知识性错误

胡明扬先生指出:“一般来说,不提供知识的词典是不大会有的,但是提供

的知识不合乎科学或不十分合乎科学的词典却并不少见。这样,科学性就成了衡量和评价一部词典质量高低的最重要的标准。”^①这就是说,任何一部词典都必须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才能无愧于一个“典”字。当然,要使一部词典达到这种“高度”,首先必须杜绝知识性的错误。

知识性错误是词典释义的大忌。知识性错误是指释义未能把词目所涵盖的知识准确无误地表述出来,即词典给出的释义在不同程度上违反了科学性。《大词典》在这方面的问题是不少的,仅以人物的并称与合称为例:如“二远”一词,本是晋代高僧慧远和隋代高僧慧远的合称,《大词典》却解释成“指两个远离的人”。如“疆冶”一词,本是春秋时齐国勇士田开疆和古冶子的并称,《大词典》却解释为“强悍不受约束”。又如“二豪”一词,本是反对刘伶饮酒的“贵介公子”和“缙绅处士”的合称,含有讥刺意义,《大词典》却解释成“指宋王禹偁和苏轼”。《大词典》这类释义知识性错误,按照具体表现情况,可以分为显性的知识性错误和隐性的知识性错误两类。

(一) 显性知识错误

显性知识错误是指比较明显的违背科学知识的错误。这类错误主要包括典章名物错误、人物关系错误、时代错误、时令错误等。如:

1. [桃月]《大词典》为单独义项,无书证:农历二月的别名。未有自造例句。

按,《大词典》释义错误,应释为:农历三月。农历的十二个月各有其别名。其中,一月为一年之始,自古称正月或端月;二月杏花含苞欲放,称杏月或花月;三月桃李花开,称桃月或李月。补充书证两条:方辰《花月美人·缘起》:“三媳楚梦笙,桃月(三月)出生,桃花仙子投胎,现居岳州,夫婿长孙桀。”《山西日报》2001年4月17日:“今日洪洞政通人和,百业正兴。时逢桃月,春意正浓。”

2. [虞芮]《大词典》为单独义项:周初二国名。相传两国有入曾因争地兴讼,到周求西伯姬昌平断。《诗·大雅·緜》:“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史记·周本纪》:“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关于此条,庞月光先生指出:“张守节《正义》:‘二国相让后,诸侯归西伯者四十余国,咸尊西伯为王。’说明事在姬昌称王之前。其后九年文王卒,武王立,

① 胡明扬等:《词典学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十一年伐灭商立周。这样算来,虞、芮兴讼至少在立周前二十年。”^①所以本条释义“周初二国名”当作“商末二国名”。

3. [赤眉]《大词典》为单独义项:指汉末以樊崇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因以赤色涂眉为标志,故称。首证为《汉书·王莽传》:“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

按,《大词典》的“初稿本”释义为:“西汉末年以樊崇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因以赤色涂眉为标志,故称。”金文明先生于1981年在《关于引书格式的问题》中指出了“初稿本”的释义错误:“赤眉军起义在新莽末年,原稿误。”^②结果《大词典》第九卷于1992年出版时的释文还是违反了历史事实。“汉末”的概念指东汉末年,而樊崇等人的赤眉起义实际上是在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莽末年。

4. [裙带]《大词典》第二义项:比喻由于妻女姊妹等的关系。多含讥刺意。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三:“蔡拜右相,家宴张乐。伶人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讥其官职自妻而致。中外传以为笑。”蔡京妻为王安石女。

按,《大词典》的补充释义“蔡京妻为王安石女”为常识错误。王安石的女婿并非蔡京,而是蔡京之弟蔡卞。《宋史·奸臣传二·蔡卞》记载非常明确:“卞字元度,与京同年登科,调江阴主簿。王安石妻以女,因从之学。”《宋史·王安石传》亦有明确的记载:“安石暴(邓)绾罪,云‘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遂与亨甫皆得罪。”

(二) 隐性知识错误

隐性知识错误的实质也是违背了科学知识。这一类错误往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不易被一般读者发现。专业人员如果不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核查,仅凭词条所提供的书证也是不易发现其错误的。《大词典》尽管编纂严谨、释义准确,一些隐性知识错误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类失误占了《大词典》知识性错误的绝大部分。如:

1. [透糖]《大词典》为单独义项:冰糖。孤证为《儒林外史》第二十三回:“茶馆里送上一壶干烘茶,一碟透糖,一碟梅豆上来。”

按,《大词典》沿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注释本的注释,从而导致释义错误。据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介绍:“透糖”为食品名,淮安地方名吃。端午节时以白面掺以糕点饼屑,揉成面团,切块后用麻油炸成金黄

① 庞月光:汉语大词典失误管窥[J].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37页。

② 金文明:关于引书格式的问题[J]. 汉语大词典简报(增刊),1981年第96期,第23页。

色。晾干,用白糖和桂花、玫瑰卤等调和成汤汁浇在面块上,待汤汁浸透后即可食用。徐淮《淮安端午吃透糖》:“端午节前两天,莲儿店里的透糖上市了。全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①吴敬梓为安徽全椒人,《儒林外史》第二十三回正是描写江淮一带的生活,正好涵盖了“透糖”产地淮安的生活。《大词典》将“透糖”望文生义地理解为“透明的糖”,从而得出“冰糖”的结论。其实,只要深思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解释不合情理。试想,自古以来有谁会下茶馆吃冰糖呢?

2. [蒜钵子]《大词典》为单独义项,无书证:方言。大蒜的根。自造例句:“拳头有蒜钵子大。”

按,《大词典》不明方言,释义错误。大蒜的根为长条细须状,自造例句用来比喻“拳头”,确属“蹩脚”的比喻。实际上,“蒜钵子”即蒜白子,北方人用以捣蒜泥的器物,长圆形,较拳头为大。有用石头雕琢出来的,亦有窑火烧制而挂釉的。^②补充两条书证:杜鹏程《保卫延安》第二章:“他个子不高,脊背能擗面,脸面红喷喷的,长得多虎势!他那两条胳膊呀,比椽还粗,拳头有蒜钵子大。”《保卫延安》第五章:“他闪了一下,躲过敌人的枪托,又抢前一步,用蒜钵子似的拳头,照敌人脸上猛击。”《大词典》所造例句,实为《保卫延安》第二章的书证。当时杜鹏程已经“解放”,把名家书证改头换面变成自造例句,不知是何用意。

3. [宫莲]《大词典》为单独义项:莲花瓣的美称。孤证为清纳兰性德《清平乐·元夜月蚀》词:“影蛾忽泛初弦,分辉借与宫莲。七宝修成合璧,重轮岁岁中天。”

按,《大词典》释义错误。孤证中的月光与烛光两相对应,宜释为:宫中莲烛。典出唐裴廷裕《东观奏记》卷上:“上将命令狐绹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对,尽蜡烛一炬,方许归学士院,乃赐金莲花烛送之。院吏忽见,惊报院中曰:‘驾来。’”后常以“金莲”或“宫莲”指宫中的蜡烛,或用为受帝王赏识重用的典故。如:宋毛滂《天香·宴钱塘太守内翰张公作》词:“对罢宵分,又是金莲,烛引归院。”补充两条早证:宋刘克庄《沁园春·九和》词:“更宫莲引入,视淮南草,御屏录了,露会稽章。”宋文天祥《齐天乐·甲戌湘宪种德堂灯屏》词:“回首宫莲,夜深归院烛。”

4. [细乳]《大词典》为单独义项:茶中的精品。孤证为宋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诗:“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① 徐淮:淮安端午吃透糖[J]. 祝您健康,2007年第6期,第31页。

② 曲文军:论汉语大词典的严重缺陷[J].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40页。

按,《大词典》望文生义。“细乳”并非“茶中的精品”。宋人斗茶,以茶面泛出的茶汤色白为上品,“乳”即指白色汤花。如:宋苏轼《试院煎茶》诗:“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宋黄庭坚《满庭芳·茶》词:“纤纤捧,研膏浅乳,金缕鹧鸪斑。”宋徽宗《大观茶论·盏》:“底深则茶宜立而易于取乳。”故“细乳”一词宜释为:指茶面上泛起的细腻的白色汤花。补书证:宋陆游《十一月上七日蔬饭骡岭小店》诗:“建溪小春初出碾,一碗细乳浮银粟。”此证中的“细乳浮银粟”,意为细白的汤花如漂浮起的银粟。

二、误解古意

从汉语词汇发展史的角度看,许多词语在漫长的发展衍变过程中,它们原来所具有的一些古意,或在某一时期曾经产生过的特殊意义,由于种种原因到了后代往往隐而不显或成为罕见的用意。这类词语中一般并无特别生僻的语素,但组合方法比较少见,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释义失误。

(一) 词义冷僻造成误解古意

《汉语大词典编写和审稿工作条例》规定:“对原书词义不明,一时又找不到其他参证资料的,则不予立目,或暂作‘存目’,而不要强作解释,以致造成错误。”^①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对词义冷僻词目的误解往往有两种情况:一是开始就勉强释义,从而导致释义失误;二是在扫尾处理“存目”时,为了解决部分积压问题而生硬解释,结果造成释义失误。如:

1. [宾帝]《大词典》为单独义项:语本《逸周书·太子晋》:“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孔晁注:“言死必宾于天帝。”后即以“宾帝”指先帝。孤证为唐沈佺期《追册章怀太子张良娣文》:“恩绝宾帝,七日无归;义申从子,百龄先谢。”

按,《大词典》释义错误。“宾帝”为动词性词组,而不是名词性的“先帝”。孔晁注文“言死必宾于天帝”,应为“言死必宾于先帝”。从词性上看,“宾”乃名词意动用法,“宾帝”即“以先帝为宾”。《大词典》收“宾天”一词,释为:即以天为宾,婉指帝王死亡。故“宾帝”的正确解释应是:即以先帝为宾,婉指太子死亡。^②能够同《逸周书·太子晋》的内容相印证,且内容更丰富、更具体的文献资料是《艺文类聚》卷十六“储宫部”引《春秋外传》的文字,全文引证如下:

“师旷见太子晋曰:‘吾闻太子之语,高于太山,愿闻一言。’太子曰:‘吾闻太师之来,喜而又惧,汝知人年长短吉凶也。’师旷曰:‘君色赤,君声清,火色不

① 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编纂手册[M]. 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1981年版,第100页。

② 曲文军:“宾帝”非“先帝”小考[J]. 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第133页。

寿。’太子曰：‘然，却后三年，吾上宾于帝，汝慎无言，殃将及汝。’太子时年十五，后三年而卒。”

这条资料中的“后三年，吾上宾于帝”以及“太子时年十五，后三年而卒”已表明“宾帝”即为太子死亡的婉称。《大词典》所引唐代沈佺期《追册章怀太子张良娣文》中的“宾帝”亦是指太子死亡。尚可补充两条书证：《北齐书·文苑传·颜之推》：“昔承华之宾帝，寔兄亡而弟及。”该书证中的“承华”代指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承华之宾帝”即指昭明太子萧统之死。唐吴筠《缙山庙》诗：“王子谢时人，笙歌此宾帝。”该书证中的“王子”指周灵王太子晋，“笙歌此宾帝”谓辞世升仙。

2. [斗姑娘]《大词典》为单独义项：一种儿童玩物。孤证为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赤包儿》：“斗姑娘，形如小茄，赤如珊瑚，圆润光滑，小儿女多爱之，故曰斗姑娘。”

按，《大词典》望文生义而致误。“斗姑娘”为植物果实名，即酸浆果。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记载非常明确：“斗姑娘，今通称为豆腐粘，在书上则名曰酸浆，《尔雅》云寒浆，郭注今酸浆草……鲍山的《野菜博录》说的最为明白，云姑娘菜，一名红灯笼儿，一名挂金灯。苗高尺余，叶似天茄儿叶窄小，开白红，结房如囊，似野西瓜，子如撮口布袋，如樱桃大，赤黄色，味酸可食。总结起来，因为味酸，浆如豆汁，故名酸浆，名豆腐粘；房如灯笼，故名红灯笼儿，名挂金灯，又一名鬼灯；为女儿所喜爱，故名斗姑娘。”

3. [羸行]《大词典》为单独义项：远行。孤证为唐范摅《云溪友议》卷十一：“羸行出家儿，心中未平实。贫斋行则迟，富斋行则疾。”

按，《大词典》释义错误。董志翘先生认为：“羸行”指出家人不遵戒行，与“高行”相对，“高行”则指律行精进者。《大词典》释为“远行”，盖因下文“出家儿”而产生的联想，误甚。^①董先生列举的第一个证据是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崇真寺》：“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羸行。”董先生同时指出：“羸行”又作“粗行”，首证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四年十月》：“其被拆寺僧尼，粗行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尽勒还俗，递归本贯，宛（充）入色役。”第二证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五年四月五月》：“前年以来条流僧尼，即简粗行不依本教者还俗，递归本贯。今年不简高行粗行，不论验僧大德内供奉也。”

① 董志翘：汉语大词典阅读散记[J]. 语言研究，1998年第2期，第165页。